一种尴尬的际遇

——现代语境下乡村德育课程的境遇与可能路径

吕丽艳*

[摘 要] 在现代性的浪潮中,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日益成为一个消逝了的概念。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乡土"更是一种"乡愁",是一个在现代性的"孤岛"安放灵魂的精神想象。农村德育在这样的现代性的遭遇中,也呈现出一种尴尬的际遇,必须在现代性背景下的农村语境中,重新定位课程所处的外部环境和时代境遇,重新建构课程的对象、资源、目的等基本问题。

「关键词】 现代语境;乡村教育;德育课程

乡村,一个迷人的字眼,一个魂牵梦绕的意境,也是一个现代人尴尬的精神际遇。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以锐不可当的态势滚滚向前,在历史和文化意义上,乡村已经日益成为一个消逝了的社会空间和精神意境。但是作为生活在现代性"孤岛"上的城市人,"乡村"意境也日益成为一种孜孜以求的情感依恋,一种梦寐以求的精神理想。这种现代性的社会和精神的际遇,就造成了现实生活中一种无言尴尬:一方面是乡村的消逝,一方面是乡土的追求。在这种悖论性的语境中,对乡村德育的思考就呈现出一种与以往的乡村教育研究不同境遇。这就需要在进行乡村德育课程研究的时候,突破以往研究的藩篱,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与定位,重新厘定问题,重新建构理论话语。

一、现代语境下乡村的消逝与乡村教育探索

伴随着工业化的征程,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化和全球化不可阻挡的来势。随着新信息革命的出现,更是前所未有地加快了这一趋势的步伐。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正如某些学者所宣称的那样,越来越"平坦化"^①,国家之间、区域之间、乃至城乡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传统的横亘在这些对

^{*}教育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人员、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210097。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学校道德教育与新农村文化建设研究"(14JJD880012)的研究成果之一。

①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第1页。

象之间的藩篱正在被拆毁。相对于"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社会,现代人——无论城乡——越来越趋向于生活在共同的信息空间和物质空间之中。在这种现代性趋势的背景中,"乡村"的影像日渐模糊,"乡土"的概念更像怀念,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正在从现代人的生活和视域中"消逝",这种"消逝"可以以农村社会的"去乡村化"来指称。

- 1. 信息世界的扁平化。现代世界是一个信息化的世界,正如《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所指出的,windows、互联网、google等新的信息工具正在以强大的动力"碾平"这个世界^①。人们接受外部世界的信息渠道前所未有地通畅了,那些发生在遥远地方的事件不再那么遥远,甚至于透过一些社交软件或网络社区,无论你处于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地参与另外一个地方的事件。对于农村社会而言,这些变化一方面使得农村居民前所未有地参与到农村以外的世界,使得"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传统农村社会的封闭性成为一种不可能;一方面也使得农村以外世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透过资讯而"闯入"农村社会,农村居民不再单一地透过纯农村的方式看待农村,而越来越以农村以外的方式来看待农村和农村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陶渊明笔下桃花源人"不足为外人道也"的生怕被打扰的心境恐怕早已与现代农村人相去甚远了。这些使得农村社会在社会参与和价值形成上,日益突破城乡二元的界限,"去乡村化"。
- 2. 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但是信息革命带来的"资讯"闯入了农村社会,现代的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也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农村社会的生活方式。现代交通技术和物流技术的发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产业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传统版图,资本由于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天性,总是极力寻找更低的成本和更大的市场。一方面,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镇企业到本世纪初的招商引资,都使得工业资本"侵入"传统的农村版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传统的产业结构,从而也影响了农村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在另一方面,现代工业品的消费,以及超市、网购等现代商业模式,也锐不可当地"侵入"农村的领地,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商业文明日益瓦解,而纳入现代模式。此外,随着农村电力工程、供水工程的建设,也使得电视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文化生活,统一生产的自来水等取代了传统的自取水,一些传统的如社戏等文化活动日益变成象征意义,水井、轱辘等乡土意味的标志日益远离农村生活。这些产业结构和商业模式的"入侵",都与农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许多方面日益拉平了生活方式上农村与城市差别,使得农村社会在生活方式上日益"去乡村化"。
- 3. 农村生产方式的改变。不但是工业产业随着资本的流动"入侵"了农村的领地,现代生产方式甚至也正在"改造"农业自身的生产方式。在应对市场经济的动机下,许多地区都出现了或出于资本运作的原因或出于农民自身的主动自觉而产生了农业生产规模化的现象。以苏北南通为例,2007年全市产出4.5万元/hm2以上的作物面积占比达1/4,7.5万元/hm2以上的农业项目面积已达到5.33万公顷。2007年南通市农业招商引资总额55.4亿元,高效农业比重达34%。2008年年初,南通市政府把继续争创全省高效农业规模化第一市,力争净收益3万元/hm2以上农田占比提高5个百分点作为2008年重点工作目标之一。②这种农业规模化的产生一方面是出于城市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农产品的需要,另外一方面也是出于农民对于商品经济的价值追求。除了作物生产之外,农村的畜牧业生产早已经走上了规模化的道路,传统乡村社会三两只鸡游走庭院的景象早已被动辄成百上千的现代化(家庭)养殖场所取代。这些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得耙犁等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工具成为往事,乡村社会与陶渊明所描述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景况相去甚远,变成在生产方式上日益"去乡村化"。

①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第42—60页。

②王志强等:《南通市高效农业规模化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现代农业科技》2008年第24期。

- 4. 农村人口结构的改变。计划生育政策还带来了农村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形的结构(长辈人口多,晚辈人口少),而这个结构是与传统农村的正金字塔形(长辈人口少,晚辈人口多)恰恰相反的,这种人口结构的改变对传统乡村伦理的改变不容小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上以长辈为中心的家族伦理,而变为以晚辈为中心的家庭伦理)!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随着整个中国大规模城市建设期的来临,"民工潮"等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一个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现象。由此而带来的农村人口结构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解构了农村社会的整体结构,随着青壮劳动力的普遍外流,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成为农村人口的主要组成,这在某种程度上瓦解了农村正常的社会生态。这种瓦解不但体现在农村人口结构的改变上,有研究表明这种还体现在存在于分居城乡的夫妻之间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日益分化上①,这是对乡村家庭伦理的重要瓦解。所以说,农村人口结构的改变,也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并加剧了农村社会的"去乡村化"。
- 5. 农村治理结构的改变。2001年民政部联合有关部门下发了《关于乡镇撤并工作的指导意见》,对各地正在开展的撤并工作进行了指导。中央2004年1号文件对撤乡并镇并村提供了政策支持,这个文件指出要求"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积极稳妥地调整乡镇建制,有条件的可实行并村……"有研究透过从1992年到2004年间全国乡镇和行政村数量的变化,来显示此间村镇撤并的趋势.^②

指标	1992	1999	2000	2002	2003	2004	2004年和 1999年比	2004年和 1992年比
乡镇数(个)	48250	44741	43735	39054	38028	36952	-3.75%	-2.20%
# 乡数	34115	25557	24043	19243	18440	17781	-7.00%	-5.29%
#镇数	14135	19184	19692	19811	19588	19171	-0.01%	2.57%
村民委员会(个)	806032	737429	734715	694515	678589	652718	-2.41%	-1.74%
农村总人口(万人)	84799	79563	(01年数字)	78241	76851	75705	-1.64%	-0.94%
乡村户数(万户)	22849	23810.5	24148.7	24569.4	24793.1	24971	0.96%	0.74%
乡镇平均人口(万)	1.76		1.82	2.00	2.02	2.05		
村平均人口(万)	0.11		0.11	0.11	0.11	0.12		

1992年以来我国乡镇机构和行政村的变化情况

伴随着村镇撤并的是农村地区始于2000年左右的大规模学校撤并。自2000年到2009年间,全国农村小学校数由59.78万所(含教学点)减少到了30.5万所(含教学点)减少了48.96%。③这种乡镇撤并表面上是行政区划的重整,但实际上所带来的结果是农村治理方式的"集中化",这种集中化打破了原先小行政区划治理模式中的"熟人"社会的方式,而更加代以依靠制度的现代治理方式。农村学校的撤并更是把大量原本存在于田野间的乡村学校搬到了行政和商业中心的城镇上,从而造成实际上的农村教育的"城镇化"。这种治理结构的改变所带来的是农村治理方式上的"去乡村化",这在农村教育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这个数字是2004年与2001年相比。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摘要2005。

①徐丽:《贵州农村留守妇女生活现状研究》,《现代经济》2010年第5期。

②党国英:《乡镇撤并已经完成,实际效果还需检验》,《人民论坛》2006年第2A期。

③范先佐:《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原因、动力及方式选择》、《教育与经济》2006年第1期。

二、现代语境下乡村德育课程的境遇

在梳理了乡村的消逝和乡村教育的探索模式之后,我们需要再来思考一个问题,这些已有的乡村教育实践模式或者构想,它们符合当下农村社会的现实存在吗?

首先是新式学校运动。在某种意义上,这场运动本身就是"去乡村化"的现代主义应对。要知道,这场起始于清末民初的运动所发生的背景,是西方列强带着他们的工业文明的成果对当时中国的人侵,它的初始动机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只不过在当时的国情中,中国最主要的社会形态不是西方兴起的工业文明,而是农业文明,因此在国家主义的视野中,所谓的教育现代化就是"村村有学校"。不是那时的政府不愿意发展城市教育,而是因为当时根本不存在所谓成熟的"城市"(如果有的话,也是被列强所控制的通商口岸)。因此,这种新学运动本身就是对西式学校的乡村移植,它首先是对抗当时根植于乡村社会的私塾教育的,是"去乡村化"而"西化"的。因此从动机上并不能说是严格文化意义上的乡村教育。其次,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这种西学运动早已经显示出了它的成功,这种"新式学校"早已经根植于当下的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的实践中,而不需要任何的"运动"了。

其次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乡村教育。晏阳初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有着相同的动机:他们走上这条艰苦的乡村建设之路,主要原因是他们都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不满,又拒绝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因而谋求和平改良的途径。其次,他们都认为中国问题的实质不是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是文化和教育问题。再次,他们都认识到了中国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痛惜农村经济的惨状,试图在现有制度下,以农村为切入点,以教育为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改进、生产技术的改良振兴农村,从而达到以乡村发展带动国家发展,解决中国问题的目的。①尽管与国家主义不同,他们所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但是相同的是,他们的目的都是想透过农村的自强而实现国家的自强。他们的共同目的都是透过教育来改造乡村,实现民族自救。因此,在当时的国际风云中,他们其实和新式学校运动一样,有着某种现代主义激发出来的气质。当然在梁漱溟的实验中,融合了许多新儒家"和谐"的哲学观和社会观,但是一方面这无法改变他自身的动机,另一方面,相对于现代社会而言,那个时代并没有现代社会的发达商品经济和信息文明,因而尽管那时的中国乡村已经处于与世界的对话当中,但理论上仍然可以实现一个相对独立的根植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社会理想。但是在处于信息化和商品时代的现代社会中,这种理想断断没有在普遍意义上自然实现的可能性。

第三是乡村教育文化选择问题的探索。有论者主张,乡村教育要实现从"农村教育"到"乡村教育",从"趋城市性"到"乡村性",从"时间"到"空间"的转型。②刘铁芳以这种立场指出,乡村教育重建的课程目标乃是在一般性地促进乡村青少年发展的基础上,面对当下乡村少年生存的现实,引导他们更多地认识脚下的土地,建立个人与乡土的和谐联系,培育他们的文化自信,从整体上促进乡村少年健全人格的养成。乡村教育课程设计的基本原则主要表现为普遍性知识与乡土知识之间的平等性、差异性和开放性。乡村教育课程设计的基本路径包括:乡土课程资源的开发、乡土教材的开发、乡土文化阅读资源的开发以及整个课程体系中乡土价值的凸显。乡村教育课程设计的根本指向乃是乡村生活方式的重建。新乡村教育课程开发、新乡村理念的培植、新乡村生活理想的开启,成为当下乡村

①张学博等:《晏阳初与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之比较及对新农村教育的启示》、《职业教育研究》2007年第12期。

②耿涓涓:《乡村教育研究的转向》、《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教育重建的基本课程理念。^①相对于乡村建设运动而言,这种探索更加明确也更加迫切地主张乡村教育的文化性。这种探索也成为目前乡村教育研究的主流呼声,但是,在当下农村社会的现实处境中,这种研究取向也给农村德育课程带来了一些挑战。

- 1. 为什么需要"乡村德育"? 刘铁芳在《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起点与路径》一文的开头作了这样的描述:偶然看《湖南卫视·乡村发现》,采访国内知名摄影家焦波,他的代表作是以自己老家父母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全记实性的《俺爹俺妈》。他的朴素的摄影中传达出来的来自乡村社会的温暖人性自不必多说,其中他母亲说的一句话让我记忆深刻,他年迈的母亲对他说,你在外面奔波,累了可以回来种地。我忽然想起,我的父亲也曾经跟我讲过几次,在外面不好过了,不要紧,可以回来种地。②这段带有散文气质的话精当地表述了在当下社会中,呼唤乡村教育的精神意义:乡村是对城市文明的逃离的一种可能性,乡村教育也是一种心灵栖息的理想追求。作为文化意义的乡村,不但是在空间意义上更是在精神意义上,是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的现代人的一个理想中的精神空间。乡村文明的意象形成了一种与城市文明意象的对比,共同构成了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因此消灭乡村就等于消灭了现代人一半的精神世界,使得现代人在城市文明的裹挟之下,没有任何逃离的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城市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对"乡村"的呼唤是城市人精神突围的一种努力。无论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还是鲁迅笔下的《社戏》多么的美,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已经出离了乡村的城市人,这些作品也只是作者的精神眷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当下对乡村教育和乡村德育的呼唤,是现代城市人的精神呼唤,是一种对"去道德化"的城市文明的道德逃离,是以城市人的乡土眷念为肇始的。
- 2. 乡村德育的目标是什么?这种以城市人的精神逃离为肇始的乡村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要塑造一个符合这种精神追求的乡土空间,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在空间上保护农村社会的乡土性;当然这个目标的实现乃是在农村这一空间中以针对农村儿童为对象的教育来实现的。正如刘铁芳教授所说的:"乡村教育重建的课程目标乃是在一般性地促进乡村青少年发展的基础上,面对当下乡村少年生存的现实,引导他们更多地认识脚下的土地,建立个人与乡土的和谐联系,培育他们的文化自信,从整体上促进乡村少年健全人格的养成。"这个目标表述至少有三个要素,第一是当下的农村社会是一个"现实的"乡土社会,第二是建立乡村少年个体与这个"现实的"乡土社会的生命联系,第三是建立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自信,养成健全的乡土人格。这个目标并不难理解,因为"乡土"或者"乡村"实际上是在一个特定空间内的非空间概念。"在特定的空间内"是指这个概念在地域上是存在在农村这一特定的空间之中的;"非空间"是指这一概念实际上是精神性的、非物质非空间的。也就是说,"乡土"或者"乡村"是存在于农村场域中的一种属乎人的精神性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人或者说人身上的这种精神气质使得"农村"成为了"乡村"。因此从根本上说,要塑造或者保护"乡村",就必须对关涉这一空间的人进行"乡村"教育,使得他们生成或者保有这种特定的精神气质或者人格,从而使得这一空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反过来说,如果不需要塑造或者保护"乡村",就没有必要对特定的人进行乡村教育。
- 3. 谁的乡村德育?但是真正的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这种背景下的乡村德育究竟是谁的?是乡村少年的还是城市人的?这种寄托着城市人的精神梦想的课程,透过乡村少年的方式来实现,这是否符合课程的伦理?如果说乡村教育的课程目标是要使得乡村少年认同并委身乡土文化,"建立个人与乡村的和谐关系",那么,这是他们自身的需要吗?是他们自身的意愿吗?是他们自身的生活选择吗?

①刘铁芳:《回归乡土的课程设计:乡村教育重建的课程策略》,《现代大学教育》2010年第6期。

②刘铁芳:《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起点与路径》、《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8年第9期。

其实当下亿万的农村青壮年和少年,已经或者正在以考学、经商、务工的方式用他们的脚进行了投票,来表达他们生活的意愿和对生活的选择;他们甚至在以改变农村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农村"去乡村化"的现代化的选择。农村青少年需要乡村教育、需要乡村文化,这是一个值得推敲的假设。事实上,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和商业文明,早已经把他们的生活与现代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对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而言,融入城市恰恰是他们的梦想选择。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逆他们意愿的城市人的乡村教育的精神愿想强加在他们身上,甚至透过他们来实现正当吗?当前,对于德育课程的城市本位、忽略农村生活的视野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广泛的共识,并且大受批判。但是这种以乡村生活理想为中心的课程是否是另外一种更深的城市本位呢:以城市人的精神需要为中心,违背农村青少年的生活意愿和选择?这是否是另外一种形式的以城市需要为中心的强势的意识形态的强加?这可以说,是当下乡村教育研究在现代语境中的一个尴尬的机遇:一方面是城市人逃离城市的精神需要,一方面是农村人融入城市的主动意愿,在这两者的交织之中的乡村教育应当如何安身?

三、现代语境下乡村德育课程的可能路径

现实一点讲,在一个高度信息化,并且交通和物流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保持纯粹"乡村"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能;把特定的人群和乡村这一特定文化和场域捆绑在一起也是一种不可能:毕竟我们无法组织任何人在现有条件下自由地发现资讯,并通过自己所掌握的资讯进行自己生活和道路的选择。然而,若是这样的话,文化选择意义上的乡村教育还是一种可能的命题吗?本文认为,在现代语境下的乡村教育课程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可能路径来规避上文所揭示的伦理问题。

- 1. 建立面向文化和心灵的乡村德育课程。正如当下乡村教育所兴起的肇始动机一样,其本身就是出于现代都市人逃离城市文明的文化和心灵的需要。既然如此那么乡村德育课程就应该回归到关顾文化和心灵需要的位置上来,而转离对特定地域和特定对象的关顾。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既是一个文化选择,也是一种精神存在,是人在经历了城市文明的洗礼之后,必不可少的精神存在的一部分。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乡村德育课程的目标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特定农村地域的乡村或乡土社会的塑造或保持,而应该将眼光投放在关注人这种文化和心灵的需要本身,这样当下背景下的乡村教育才有明确的方向。因此,在课程设计中应该放眼在激发并揭示这种需要,并且将之与乡村这一特定的社会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关涉起来上。
- 2. 建立整体性的、均衡性的乡村德育课程。乡村德育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它不是单纯地局限在传统所理解的德育的范围内,也不是简单的和农村生活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当下现代语境中乡村德育首先是一种需要描绘出来的生活,需要从逐渐消逝了的乡村社会中提炼出它的德育价值。从另一方面,乡村德育的特殊性还在,它不是以抽象的伦理价值为主题内容的,而是靠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等等共同"搭建"起来的一种生活化的伦理理想:也就是说不存在抽象的乡村伦理,只存在具体的乡村生活,或者乡村生活就是乡村伦理。从这层意义上讲,乡村德育课程的建设,必须关注与乡村伦理密切相关的整体的乡村生活的建造。从这个角度讲,可以说乡村德育就是乡村教育。乡村德育课程的发展,必须关注乡村伦理相对与乡村生活存在的整体性。另一方面,在现代语境中完全独立或异质与城市文明的乡村生活已经很难存在了,甚至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会越来越难,从某种意义上现代人——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只能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的交织之中。在城市里人们常常希望脱离现代生活方式,在农村里人们越来越希望融入现代生活方式。因此,关顾整体性的乡村生活的乡村德育还需要注重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和乡村生活方式交织的现实,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均

衡,甚至需要维护这种均衡。

3. 建立面向现代人的乡村德育课程。需要强调的是,必须要正视对乡村生活的精神需要是现代人——无论城乡——的时代精神状况的事实,这样的话,乡村教育的对象不应该仅仅受场域的限制只关涉农村青少年,而应该同时关涉城市青少年。因为从某种意义上,作为一个现代人,每一个人都需要认识自身的这种对乡村生活需要的精神需求。对于城市青少年而言,他们需要知道除了城市生活之外,还有一种生活方式可以安放他们的心灵空间;对于农村青少年而言,他们需要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乡村对于他们以后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和价值,无论将来他们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更加现代化的农村,这种乡村生活的意象永远都会是他们文化和心灵需要的一部分。在一个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乡村德育的价值不是要向特定农村青少年强加一种生活形态,而是要教会无论城市青少年还是农村青少年,他们将来生活的可能性以及对这种可能性的选择。从这层意义上讲,乡村德育课程的对象设定应该突破城乡的限制,而针对所有青少年的,是一种面向将来的现代人的一种精神的、文化的、人格的和可能性生活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在特定的人生阶段和人生际遇中更好地进行精神和生活的选择,而不是绑架他们这种选择的自由。一句话,如有论者所说到的,乡村德育课程需要同时防止"城市中心"和"农村中心"两个不良倾向,①从而面对所有的现代人。

(责任编辑:蒋永华)

An Embarrassed Encounter: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ssible Ways of Rural Moral Education in Modern Context

LÜ Li-yan

Abstract: In the wave of modernism, the concept of countryside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is disappearing day by day. In modern life, "countryside" is going to be a kind of "nostalgia" and an imagination for the souls in the isolated island surrounded by modernism. In this context, rural moral education is in great difficulties, which force us to rethink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the time context where the rural moral education is carried out and to rebuild the objects, resources and aims of its curriculum.

Key words: modern context; rural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①容中逵:《当代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基本架构》、《中国教育学刊》2011年第3期。